岱海考古（二）

——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编著

田广金 秋山进午 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1

内 容 简 介

1995～199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合作，在岱海地区联合开展“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术研究。本书详细报道了中日合作的研究成果，有石虎山Ⅰ、Ⅱ、王墓山坡上、板城史前遗址及饮牛沟战国墓地发掘报告4篇，另有在发掘资料的基础上，中、日学者撰写的研究文章。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者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田广金，秋山进午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ISBN 7-03-009545-6

Ⅰ. 岱… Ⅱ. ①田…②秋…③内…④日… Ⅲ. 考古－凉城县－考察报告 Ⅳ. K87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9774号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1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5
印数：1— 1 500 字数：730 000

定价：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中日合作进行岱海地区考古研究的收获和意义…… 田广金(1)
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研究概况…… 秋山进午(8)
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18)
王墓山坡上遗址发掘报告 ……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146)
板城遗址勘查与发掘报告 ……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206)
1997 饮牛沟墓地年发掘报告 ……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 (278)

岱海地区距今 7000～2000 年间人、地关系演变研究 …田广金　唐晓峰(328)
石虎山遗址陶器研究 ……
…… 宫本一夫　小田木治太郎…… (344)
王墓山坡上遗址陶器编年与聚落研究…… 宫本一夫(360)
环岱海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田广金　郭素新(377)
朱开沟文化因素分析及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杨泽蒙(411)
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地域性及变迁…… 宫本一夫(454)

岱海遗址群的孢粉分析…… 铃木茂(482)
石虎山Ⅰ遗址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 黄蕴平(489)
石虎山Ⅰ遗址猪骨鉴定…… 西本丰弘(514)
饮牛沟墓地 1997 年发掘出土人骨研究 …… 何嘉宁(527)

中日合作进行岱海地区考古研究的收获和意义

田 广 金

为了加强中外考古学术交流，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世界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借鉴外国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的成果和经验，进一步提高我国考古学研究水平，同时也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现状和前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内蒙古文化厅领导关怀和指导下，经国家文物局(95)文物字第502函批复同意，与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合作，共同在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地区开展“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及“游牧骑马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古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时间为1995～1997年（每年4～6周），历时3年完成。关于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队三年来的工作情况，详见秋山进午先生的《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研究概况》一文，这里不详细介绍。这里仅介绍三年来的考古收获和岱海考古的意义。

（一）岱海地区考古概况及中日合作考古的主要收获

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时由我带领全区文物干部训练班全体学员发掘了凉城县毛庆沟墓地（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晚期）。为了编写毛庆沟墓地发掘报告。于1980年春对周围地区的人文环境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了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石城聚落址。1982年我带领考古发掘训练班西部区的全体学员，在老虎山遗址进行发掘实习，又经1983年的钻探和发掘，初步了解到老虎山遗址是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与此同时，还在鄂尔多斯发掘了龙山时代晚期至商代前期的朱开沟遗址。当我们把几年来考古发掘收获向苏秉琦先生汇报时，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1984年在苏先生倡议和指导下，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内蒙古西部区原始文化研究会”，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等先生对内蒙古的史前考古进行了探入细微的剖析，发表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先生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和郭素新下决心在岱海地区将区域性考古工作坚持下去。在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文化厅关心、支持下，1984年在遗址附近筹建了工作站。随后，我带领技工在岱海北岸又

调查了西白玉、板城、园子沟、大庙坡等龙山时代早期遗址。1986 年，郭素新带领全区文物普查领队班全体学员，在老虎山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1987～1988 年，对园子沟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工作；我则在西白玉、面坡和板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试掘。通过这一系列的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我们对老虎山文化聚落遗址群的详细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又在岱海南岸调查了红台坡、东滩、王墓山坡上等仰韶时代遗址。1989 年，在配合丰镇—准格尔铁路建设时，发现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王墓山坡下聚落遗址。

这样，在岱海地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先后调查了自仰韶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史前遗址 30 余处。我们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时期遗址间不仅文化内涵差异很大，而且上下之间在年代上还出现了相当长的时间空白。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开始注意各个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的作用问题。从 1986 年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合作，进行内蒙古中南部环境考古研究。其核心工作是研究不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区域环境总特征，分析其地域性与非地域性差异，从而为探讨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文化区系类型差异和形成背景等，提供环境依据。

以上各项工作在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于 1989 年秋又在老虎山工作站召开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讨会”，严文明，李伯谦、韩伟和乌恩等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我们把本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

1990～1991 年对王墓山坡下聚落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同时，又试掘了王墓山坡中和红台坡上遗址。

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物分布概况、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以及有关北方民族青铜文化研究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对岱海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的综合考察，对了解各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考古学文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探讨该地区农业文化起源和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等，均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资料。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亲临实地考察。1993 年和 1994 年，以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会长、大手前女子大学秋山进午先生为首的，由东京、九州等大学考古研究机构组成的考察组两次来内蒙古访问考察，对内蒙古的考古学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内蒙古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中日学者间的接触和交流，日本学者主动提议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资金和设备，进行“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及“游牧骑马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古学者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1995 年，中日学者组成了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从 1995～1997 年的三年中，先后对王墓山坡上、石虎山、板城遗址和饮牛沟墓地等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1995 年发掘的王墓山坡上遗址，在 563 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房址 15 座、窖穴 25 个，出土陶、石、骨器 200 余件，时代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

关系，可划分为早、晚两段。能明显看出早、晚段房址的分布规律，其晚段房址已具有从浅穴式向地面式、屋顶从锥体式向两面坡式、由单间向双间发展的过渡型特征，为研究本地区海生不浪文化晚期的文化内涵及分期树立了标尺。

1996 年在石虎山遗址清理出两处聚落址。石虎山Ⅱ遗址为一处比较完整的小型村落遗址，发现了 14 座房址，23 个灰坑，其文化性质类似后岗一期文化，但又有自身特征。石虎山Ⅰ遗址被平面呈圆角方形围沟环绕，东、南、北面各有一门道。房址的形制与Ⅱ遗址近似，说明两处聚落的年代相距时间不长。Ⅱ遗址的文化内涵除继承了遗址Ⅰ后岗一期文化因素外，更多的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因素。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岱海地区的农业开发，最先是由太行山东侧人群过来开发的；接着晋中人群北上，与当地后岗一期文化人群融合，出现了遗址Ⅰ的文化融合现象。另外，在围沟内发现的大量动物群标本，不仅为本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还为探讨当时的生态环境及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997 年发掘了饮牛沟墓地，清理出战国晚期至汉初墓葬 23 座，另外还清理唐代墓葬 3 座。这样加上 1982 年发掘的 15 座墓葬，可明显看出北方畜牧—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逐渐融合至完全汉化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北方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相互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述发现，对复原岱海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史前史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特别是发现了类似后岗一期文化的比较完整的聚落址，不仅在区内，在国内也属难得的资料。

总之，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着“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与日方学者精诚合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合作双方均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如日方重点搞测绘，通过复原遗址的地形、地貌，研究遗址形成时期的自然环境和聚落布局；而中方则按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编年、谱系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重点研究聚落形态。这样，在综合考察上，双方能够互助互补。三年来，利用日方提供的资金和测量仪器，严格按《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科学的发掘、详细的测绘和综合考察工作。同时，还采集了全部动物标本和植物标本、理化分析土样和^{14}C 测试标本等，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另外，中方还利用日方先进的测绘仪器，大范围地、省时而准确地测绘出以往发掘的几处重要遗址的地形、遗迹分布图。这样，我们在短期内便取得了从仰韶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以及战国至汉代不同文化内涵的七处遗址的详细科研资料，填补了岱海地区考古的某些空白。

（二）岱海地区考古的意义

近年来，我们在岱海地区先后发掘或试掘了 11 处史前遗址，按时代先后有：仰韶时代早期的石虎山Ⅱ、Ⅰ遗址，仰韶时代中期的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王墓山坡中、红台坡上、王墓山坡上遗址，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园子沟、西白玉、面坡

和板城遗址等。由于岱海地区位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心位置，是北方地区年均温零度线反复通过的地区，气候变化格外敏感。在干冷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受阻，故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这种具有区域性特征的聚落遗址的发现，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1．区域性聚落形态演变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看，岱海地区的农业开发始于仰韶时代早期，以石虎山Ⅱ遗址为代表，在此以前尚未发现农业定居聚落。石虎山Ⅱ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与北京镇江营一期文化非常相似，所出现的差异，是镇江营一期文化人群在向岱海地区移动过程中，接受了异地的影响而出现的。这个时期的聚落，尚看不出明显的贫富分化。至石虎山Ⅰ环壕聚落时，其文化内涵除了继承石虎山Ⅱ聚落的特征外，新增加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因素，如夹砂陶器上大量绳纹的出现。

仰韶时代中期的王墓山坡下聚落，其文化面貌与庙底沟类型近似，其所以出现部分差异，那也是庙底沟类型人群在北上过程中的变异。王墓山坡下聚落址，其房址的排列形式有一定规律。大房址位于遗址坡上居中的位置，其下为中、小型房址呈半圆形环绕着大房址。大房址与下边第一排房址之间留有较大的空间，应是人们活动的广场。在第一排房址和第二排房址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通道。在几座被火烧后而倒塌的房址中，其器物组合保存得比较完整，每座房址中既有生活用具，也有生产工具，说明每一座房屋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个体家庭。这个时期的社会，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早段的王墓山坡中和红台坡环壕聚落址，其文化内涵包括三种因素：一是以陶小口双耳绳纹罐为代表的内蒙古中南部文化因素，二是以陶筒形罐为代表红山文化因素，三是陶敞口和折腹钵为代表的大司空类型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区特征的海生不浪文化。这两处遗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除了椭圆形围沟之外，房址的布局不太清楚。

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王墓山坡上遗址，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可划分出早、晚两段。早、晚两段房址造型相同，只是早段房址的门向西开，晚段房址的门向南开。从晚段房址的布局看，稍大的一座房址位于遗址靠上的中间位置，其下为大小近似的小型房址，大房址和小房址均出土了成套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说明大、小房址的主人都参加劳动。从整个聚落的规模看，应该是个家族聚落，而大房址的主人则可能是家族的族长。

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遗址群，多有石城建筑。遗址的数量增多，并建在山坡向阳处，海拔较高，普遍流行窑洞式房屋，说明这个时期的气候处于冷湿时期。这些石城聚落址，多数分布于岱海北岸，每隔 3～5 公里就有一处。老虎山遗址的房址，都成排分布于经修整的层层台地上，二、三间为一组，窖址分布于遗址墙外西南部。园子沟遗址的房址分布情况与老虎山遗址相似，有二、三间房址组成一个院落，可能是由一个父辈和一、二个子辈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族，说明个体家庭的巩固。老虎山文化的

陶器很有特点，首开以袋足器为炊器的先河，这就是陶尖底腹罐、罐式鬲和罐式甗，一改以往使用平底器作炊器的传统。老虎山文化的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鼓腹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向西南直接发展成朱开沟文化；向南对陶寺文化的生产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向东南其影响达到先商文化区；再向西南影响到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的发展。

2．北方地区农业—畜牧业的转化

在岱海地区工作之前，我一直在鄂尔多斯工作。当时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即北方游牧民族考古。当我着手编写《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时，在苏秉琦先生的启发下，又开始注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问题。在朱开沟遗址发掘中，果然发现了时代最早的相当于商代前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铜刀、铜牌和装饰品等。在整理朱开沟遗址材料时，有一个现象始终无法解释，那就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群的演变关系看，朱开沟文化是一个有不同发展阶段的整体。但根据出土的器物组合和动物标本看，其经济形态有一个从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化过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正当我百思不解时，于 1986 年，幸好遇到了正对鄂尔多斯的地理环境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培军，他当时正在作博士论文，涉及到鄂尔多斯考古方面的情况，也正在找我。见面之后，我把朱开沟的发现情况向他一一介绍，他也把研究成果告诉了我，两方面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原来朱开沟文化由农向牧转化的原因，是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在此之前，有后岗一期文化石虎山类型、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和海生不浪文化等等人群，在岱海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其中除了有中原北上的农业人群之外，尚有东部区红山文化人群。所以，有关北方农业—畜牧—游牧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等有关问题，已经基本建立起了时空框架。

3．岱海地区的人地关系问题

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问题，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人类只有不断地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环境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就是探讨史前乃至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问题。

岱海地区的环境考古工作始于 1989 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教授率领地理系师生，利用暑假在岱海及附近地区进行野外采集样品工作，先后获得了两个原生地层剖面，即岱海地区老虎山剖面和大青山调角海子剖面。这两个剖面所反映的冷、热和干、湿的变化情况，与考古学各种文化的兴衰变化情况相吻合。

老虎山全新世沉积剖面，高 360 厘米，分为 14 层。从老虎山剖面中，可以发现三个湿润期发育起来的古土壤剖面。从上至下是距今 6000 年前、距今 4000 年前和距今

2000 年左右的黑垆土埋藏土。这三层古土壤代表了内蒙古中南部三个湿润稳定期。再结合在岱海湖周围其他剖面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距今 11000 年左右气温回升；在距今 8000 年以前有过一段寒冷期，如弓沟沿剖面出现融冻褶皱，岱海地区的气温降到 0℃以下；至距今 8000 年时出现重大转折，进入了温暖期，但温暖期保持不久，直至距今 7000 年以后才转向温和湿润期；在距今 6000 年前增温至最高点，一直延续到距今 5000 年前后，以后温度又逐渐降低。这期间有两次短期降温事件发生，即距今 6000 年前后和距今 5000 年前后，在岱海东河沿剖面发现的两层融冻褶皱层，即在这两个时期形成的。从苜花河口剖面提供的信息，大约在距今 4800 年左右出现了凉湿环境，一直延续到距今 4000 年以后，老虎山剖面第 7 层的黑垆土大约在此时间形成。从老虎山剖面此层上（第 5 层）出现的均匀纯净粗砂层分析，当系干冷时期的风成沉积，估计其年代在距今 3500～3000 年之间，因为这个时期全国普遍进入了干冷期。在距今 250 年以后，气候才又向暖湿方向发展，至距今 2000 年前后进入了又一个暖湿稳定期，老虎山剖面第 3 层的黑垆土层就形成于这个时期。

从岱海地区全新世沉积剖面和考古学文化的对比中看到：在距今 7000～6000 年的暖湿条件下，岱海地区出现了农业文化。开始是由太行山东侧经北京、张家口地区传入的后岗一期文化，该文化的堆积较薄，估计延续时间不长。而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沿汾河河谷北上，达岱海地区，出现了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不久，该文化也消失了，与距今 6000 年的短期降温有关。距今 6000 年以后至距今 5000 年前的高温湿润期，为当地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出现了当地的土著文化—海生不浪文化。从海生不浪文化中大量筒形罐的出现，表明该文化接受东部文化影响较浓。在岱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老虎山文化，与海生不浪文化之间存在着约 500 年的空缺，这又与岱海地区距今 5000 年的短期降温事件有关。老虎山文化在凉湿气候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出现了石城聚落遗址群和象征文明时代的鬲的前身——舉式鬲。老虎山文化大约在距今 4300 年结束，在鄂尔多斯黄河两岸发展成朱开沟文化。但在岱海地区却缺少或不见朱开沟文化的早期遗存，只有朱开沟文化三、四段遗存。估计在距今 4200 年前后气温偏低，龙山晚期文化的北界开始南移。

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岱海地区基本不见。

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发现的是距今 2600 年的农牧经济类型文化。从毛庆沟墓地的发现看，早期以牧为主，晚期牧农结合。说明随着距今 2500 年气候向暖湿方向发展的同时，农业文化也开始北上。在距今 2000 年前后，汉代遗存在岱海地区分布很密集。这与老虎山剖面距今 2000 年前后发育的墨垆土层所显示的良好生态环境相吻合。

从上述岱海地区全新世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来看，史前时期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内，人类的生存以适应环境为主，尚缺少主动改造环境的手段；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各种文化的传播方向亦发生变化。

总之，由于岱海地区正处于北方季风尾闾区东西摆动的中轴线上，即农牧交错带东西部的转换地带，地貌又有山地、丘陵、平原、沙地和台地等多种形态，再加上受湖泊的影响，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比内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区更为敏感。当季风加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时，比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当气候变得干冷时，则湖面下降，溪流干枯，森林退缩，甚至亚劣到人类，尤其是农业民族难以生存的地步。

（三）几点体会

三年的合作考察、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关系友好和谐，收获很大。主要体会是：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互助互利。中外合作的前提是要维护我国文化遗产的正当权益，我方对合作项目的研究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不仅对外方有相当的吸引力，更主要的是我方掌握了主动权。另外，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及发掘经验上，我方应具备一定的实力，这样不仅在获取资料上做到科学严谨，使外方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有所了解，并诚心学习采纳，而且对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加强国际间的考古学术交流，都具有特殊意义。

中日合作考察，由于工作时间短，加上测绘工作做得非常细，所以发掘速度和面积受到限制，对全面揭露、搞清聚落布局来讲，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遵照文物局委派的专家黄景略、严文明先生在现场考察后提出的意见，在合作考察结束后，中方又继续做清理发掘工作，故取得了较为详细的科研资料。

另外，要进行综合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协作，这对考古工作来讲，由于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力量尚有不足，致使进行综合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在时间、经费和人员等方面，尚需做些合理调整。在完成本项目的每个年度任务时，要留有余地，并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进行协作。我们先后邀请北京大学考古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单位的学者，对出土的动植物标本进行鉴定和深入研究。另外，经双方协商，为了使综合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双方还合作考察、研究以往的工作成果，为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学术成果报告专集提供资料。

中日合作考察工作，始终都得到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指导。因为中外合作属于外事活动，各级领导每次都亲自认真审查有关报批文件，听取汇报，严格把关，热心指导。遇到问题，领导亲自出现协调、妥善处理；在安全保卫、生活安排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全力以赴，照顾周到，使中日双方业务人员能够心情舒畅、专心致志地投入考察研究工作。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受到日方学者的称赞，中日间已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合作关系。

在此，我代表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的全体同仁，向给予大力支持的各有关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研究概况

秋山进午（杜晓帆译）

（一）调查准备

1．合作研究缘起

我们与著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1]的作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郭素新夫妇的初次恳谈，是在1992年即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合作调查的第二年。那年秋天，我参加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田广金先生的“内蒙古中南部的石城遗址”[2]报告，即是我们所期待的报告之一。

1991年开始的与辽宁省的国际合作研究过程中，第一年度的凌源县城子山石城，以及第二年度的南梁石城，我们注意的都是青铜时代初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遗址。而田广金先生所发表的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周围的老虎山石城遗址，则早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济南的下榻处，我们同田广金、郭素新夫妇进行了诚恳的交谈，决定在与辽宁省的合作之后，与内蒙古进行合作。

（1）第一次预备调查

在结束与辽宁省三年的合作研究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编写调查报告[3]，同时又将内蒙古和河北省作为下一个田野考察的对象，并于1993年秋天前往当地调查了解有关的考古学的状况。

9月2日至9月9日，在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的陪同下，我和宫本一夫先生，参观了期待已久的老虎山遗址和鄂尔多斯博物馆，又有幸认识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赵芳志、文物处处长苏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来学、魏坚、郭治中等内蒙古考古界诸位先生们。和辽宁省相比，感到与内蒙古的合作研究会具有更加深入的效果。

（2）第二次预备调查

依据1993年的预备调查，我们决定内蒙古为这次合作研究的对象。为了确定发掘调查地点，1994年秋，我与大贯静夫、宫本一夫先生又前往进行了第二次预备调查。从9月30日至10月12日，首先以凉城县老虎山的工作站为基点，对岱海周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进行了实地调查，而后，又以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为据点，对西拉木伦河南北的诸遗址做了实地考察。

虽然两地均分布有较多的遗址，可是，岱海周围 50 公里的范围内，有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各时期且遗物丰富的遗址，另外，从“游牧骑马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这一课题来说，在这一个地域进行研究有助于此题课的解决。所以我们选择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作为这次田野调查的对象，并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达成了国际合作研究的协议。

(3) 第三次预备调查

1995 年 3 月，我们申请的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国际学术研究）得到批准，合作研究终于可以开始运作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需要向中国国家文物局提出考察许可申请书。为了使协议更加详尽，6 月 8 日开始，我与大贯静夫先生再度对岱海周围的预定发掘地点进行了调查，由于石虎山遗址的保存状况并不如原来想像的那样，所以最终决定第一年度先发掘王墓山坡上遗址，石虎山遗址安排到第二年度。6 月 13 日，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学来、塔拉二位副所长及郭素新女士一同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调查发掘申请书。至此，在内蒙古的中日合作考古调查发掘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调查组织

调查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代表：田广金）和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代表：秋山进午）共同组成的“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队长：田广金）主持。

调查经费：1995～1997 年度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国际学术研究），研究代表者：秋山进午，研究题目：游牧骑马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课题号码：07041028）。中方的研究题目：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

三年来参加调查的人员如下：日方有秋山进午（大手前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大贯静夫（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宫本一夫（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广川守（财团法人泉屋博古馆学艺员）、小田木治太郎（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学艺员）、冈村秀典（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5 年参加）、山本忠尚（天理大学文学部教授 1996～1997 年参加）、西本丰弘（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1997 年参加）、今井晃树（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1996 年参加）、滨名弘二（九州大学硕士研究生，1996 年参加）。中方有田广金（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郭素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泽蒙（鄂尔多斯博物馆馆员）、黄蕴平（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1997 年参加）、郭治中（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1995 年参加）、索秀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1995～1996 年参加）、韩建业（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北京联会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1997 年参加）、王仁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1995～1996 年参加）、田文涛（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二）岱海周围各时代的遗址

岱海遗址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凉城县。从呼和浩特向东南越过蛮汗山，直线距离约 90 公里处就是岱海。遗址群包括岱海周边及永兴乡盆地，其范围东西约 50 公里，南北约 20 公里。

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岱海，其北面为大青山支脉蛮汗山，南面被与山西交界的吕梁山环绕。岱海属于内陆封闭型火山湖，东西约 20 公里，南北约 10 公里。湖面海拔 1226 米，其周围遗址的海拔高度在 1285～1310 米。明长城耸立在岱海南岸丘陵的腹部，在山顶上还可以眺望到绵延的烽火台。

岱海地区向南不到 10 公里，就是山西界内，正处于“农牧交错地带”，亦即“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最中央。

由于火山湖的缘故，湖岸没有那么平坦。从地貌图[4]来看，南岸是黄土台地的延伸。在南岸的丘陵地带，由西向东排列着狐子山、王墓山、石虎山、红台坡、东滩等仰韶时期遗址。北岸和东岸是相连的扇状性地带。在北岸，由西向东排列着西白玉、老虎山、板城、圪臭沟、园子沟、合同窑、大庙坡等龙山时期遗址。另外，蛮汗山南麓丰厚的黄土台地，孕育了毛庆沟和饮牛沟两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遗址。各时期遗址的分布情况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格局。这种现象，是否与生活格局有着深刻的关系呢？

如上所述，岱海周围群集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各时期的遗址。像这样一个限定的地域内，如此密集地分布着各个时代的遗址，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很少见。做为日方提出的“游牧骑马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对象，岱海周边的确是一个条件很好的调查地区。

另外，这一区域设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站，田广金、郭素新等先生已经积累了很多发掘和试掘的经验。以上介绍过的各个时期的遗址，经过长年的调查，其文化属性也已明确。虽然其中毛庆沟遗址的正式报告已经发表[5]，老虎山遗址等简报也已发表[6]，但是，要想揭开这一地区文化形态的全貌，有必要进行更大面积的发掘调查和对遗址遗物的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我们达成了对岱海周围遗址群进行为期三年的中日合作考古学地域研究的协议。

（三）1995 年度王墓山坡上遗址的发掘调查

在这些遗址中，“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选择了约位于岱海南岸正中的王墓山坡上遗址作为最初的发掘地点。

对岱海地区考古遗址的探索是从 1981 年开始的，根据 1986 年 6 月开始的两次集中

调查，在凉城县内发现了30余处遗址。

王墓山遗址位于岱海南岸中间地带，在凉城县六苏木乡南泉卜子村南1公里的王墓山西坡上。遗址坐落在王墓山西边派生出的一支山脊所形成的小丘陵上，缓缓向岱海延伸，在由上而下的斜坡上，依次分布着王墓山坡上、坡中、坡下三个遗址。

1987年的试掘中，在王墓山坡下遗址发掘了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房址6座和灰坑1个。在王墓山坡中遗址发现了一部分近似围沟的壕沟，但没有发现居住遗迹。

在王墓山坡上遗址，1987年试掘时发掘了仰韶文化后期秦王寨类型的地方性文化，即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型的房址1座（F1）和灰坑2个（H1、H2），1989年试掘时发掘了房址4座（F2～F5），1992年又发掘了房址F6和灰坑H3、H4。

在此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1995年8月4日至9月5日的一个月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对王墓山坡上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发掘面积563平方米，清理发掘了房址15座（F7～F21）、灰坑25个（H5～H29）、墓葬3座（M1～M3），其中F7和3座墓葬均属清代的遗迹[7]，基本搞清了这一遗址的全貌。

新发掘的14座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址依据其布局和层位关系可以分为两期。

门道向西的房址为1期，门道向南（仅F13向北）的房址为2期。另外，无论是1期还是2期都具有以下的特征：房间中央与后墙之间有两个灶坑，房址中心轴线右侧有柱洞两个。

从陶器看可分为两期，而且第2期的陶器还可以分出前、后段，整体来看可分为3个阶段。这与庙子沟遗址3个阶段的断代基本上是一致的[8]。

王墓山坡上遗址的发掘，为揭开这一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型的面貌提供了资料。而且，低丘陵顶部遗址的布局，打制剥片石器、筒形陶罐等文化要素，也揭示了王墓山坡上遗址与内蒙古东南部之间的关系。

在对王墓山坡上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我们对石虎山遗址做了更进一步的考察，为1996年度的调查做准备。其结果是，石虎山顶上除已知的遗址之外，在其南200米的丘陵鞍部，又发现了散布有同时期陶片的地点，我们将其定为石虎山Ⅱ遗址，并将以前的遗址定为石虎山Ⅰ遗址，以便于区别。

（四）1996年度石虎山遗址的调查发掘

王墓山坡上遗址的发掘结束之后，1996年，“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又对位于王墓山坡上遗址略北的石虎山遗址进行了发掘。

石虎山遗址是1993年发现的，与岱海东端的红台坡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由于出土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器陶红顶钵，故作为岱海地区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而引人注目。

后岗一期文化是以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其分布东自山东半岛，西至太行山脉东侧，由此向北，经河北直到北京。河北南部石北口遗址的资料已发表[9]。

石虎山遗址位于岱海南岸，在王墓山遗址稍北的高耸的丘陵顶上。丘陵被称为石虎山，它的地形与王墓山一样，也是位于一个由王墓山山顶派生出的、向西面对湖泊的山脊顶上。根据1993年的探查和试掘，判断这是一处有围沟环绕的聚落遗址。可是，探查的结果并不完全相符，虽然围沟存在，但由于地表水土流失严重，房址的保存状况不够理想。

1996年，根据中方所做的试掘结果，在石虎山Ⅱ遗址发现了房址的基址，并在探查时发现至少有3座房址的遗存。经过中日双方商议后决定，石虎山Ⅱ遗址的范围虽然不很清楚，但由于明确有房址遗迹，所以作为调查的重点，同时，尽可能地对石虎山Ⅰ遗址也进行调查，努力揭示围沟聚落遗址的全貌。

1996年中日合作对石虎山遗址进行调查是从8月3日开始，9月1日结束。之后，中方在9月份又进行了补充调查[10]。

第一年度在王墓山遗址的发掘调查，主要针对岱海周围继起的仰韶末期文化。第二年对石虎山遗址的调查，则转向了揭示岱海地区农耕社会开始时期的面貌及状态。

1．石虎山Ⅰ遗址

遗址位于石虎山山顶向东下降的马背形台地上，利用平缓的斜坡形成了一个围沟聚落遗址。这个遗址的特点是房址周围被围沟围绕。

围沟东西长130米，南北宽90米，呈圆角长方形，东、南、北边各有一个门道。西边依丘陵的顶部，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门道是否存在难以判定。我们对保留较好的围沟部分进行了测量，现存宽1.3～1.5米，深0.5～1.3米，可以窥视原来围沟的坚固性。另外，在围沟的北边上部，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围沟内部遗址地表水土流失严重，大约在其中心部位，只能确认有4座房址和8个灰坑，因此对围沟内部居住状况及布局的详细情况无法搞清。

另外，在围沟的外面也发现了2座房址，特别是位于围沟西北部外的F4，形状特殊又有大型的柱洞，具有特别的性质。

围沟内外共发现灰坑13个。围沟外发现了5个灰坑，其中的H12中出土了鹿类的部分骨骼、石块、红烧土块及完整的4具犬骨，有可能是一个祭祀坑。

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基本探清了石虎山Ⅰ遗址围沟的平面形状，围沟内外出土了大量的兽骨、陶器、石器及骨、角器等，取得很大的成果。但与预想的一样，由于围沟内部的遗存保存状况不好，对房址的布局等情况，未能捕捉到更清楚的信息。

石虎山Ⅰ遗址内外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包含了野生和家畜两类。这些动物可能是填埋围沟祭祀。对这些骨骼的研究，日方由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西本丰弘先生，中方由北京大学黄蕴平先生主持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含有已灭绝的动物。这方面的研究将对复原该地区农耕社会开始初期的自然环境起到极大的作用。

2．石虎山Ⅱ遗址

石虎山Ⅱ遗址大约位于Ⅰ遗址东南 200 米处，两遗址之间没有发现遗物。表土下即露出了遗迹，地层比较简单。为了尽可能揭示遗址的全貌，我们发掘清理了 1545 平方米，大大超过当初预定的 50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发现房址 14 座、灰坑 23 个、墓葬 1 座。

房址基本由上至下，分段横向排列在东西向的平缓的坡面上。每个房址内出土的遗物不多。该遗址出土了较多的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等遗物，但没有围沟围绕。

在两遗址周围的较大范围内挖了试掘探沟，希望寻找到墓地，但没有任何发现。这一现象，与在围沟外附近设立氏族公共墓地的黄河流域的遗址不同，表明该聚落遗址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五）1997 年度饮牛沟墓地遗址的发掘调查

饮牛沟墓地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墓地，位于凉城县永兴乡毛庆沟村东北约 2 公里处毛庆沟墓地之东 1 公里。与毛庆沟墓地一样，饮牛沟墓地也是营造在蛮汗山南麓堆积深厚的黄土坡面上，但与位于山脉之下的毛庆沟墓地相比，饮牛沟墓地位于坡面的中腹。

该墓地是 1981 年村民在放牧时发现的。第二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调查。这一次的发掘，清理了 15 座墓葬[11]。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墓向不同，埋葬方法和随葬品也不相同。

1996 年在参观饮牛沟墓地时，于新崩塌的崖面，发现有露出的、被破坏了的墓葬，估计墓地可能分布到更北的区域。为此，进行钻探，结果发现至少有 8 座墓葬。我们决定在 1997 年度的调查中，对此进行抢救性发掘，以便探明墓地全貌。

1997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21 日，在第一次发掘地的北侧和西侧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又发现墓葬 23 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呈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与第一次发掘的情况相同。另外，做为葬具的木棺，甚至木椁的出土，也与第一次调查的一样。随葬品有青铜器、铁器、玉器、骨器等，但数量极少。有些墓葬随葬有家畜的骨骼，M15 中还随葬有一只小狗。

两次发掘、调查共发现 38 座墓葬，沿等高线可以归纳为几个群。

春秋晚期开始形成的毛庆沟墓地，至战国晚期时，东西向墓葬中，开始混入南北向的墓葬。饮牛沟墓地中位于最下段的第一区，与上述的情况最为相近。但是，毛庆沟墓地与饮牛沟墓地第 1 区所显示的，北方系的东西向墓葬和中原系的南北向墓葬有明显区别，而在饮牛沟墓地沿斜坡向上的第 2 区以后发生了混合现象。即东西向墓葬中出现了棺、椁等，南北向墓葬中也可以看到北方系的器物和随葬动物骨骼的现象，很明显北方系和中原系的区别消失了。

总之，新的集团在加入构成饮牛沟墓地的原集团之后，很快就被同化了，而由新集团带来的新文化要素，也逐步融入了整个集团。

在饮牛沟墓地的各个分布区，棺和椁并用的墓葬，均限于大型的墓葬，这种现象可说明饮牛沟集团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

（六）1997 年度板城遗址的考古测量和试掘

1997 年度还对板城遗址做了考古测量和试掘。板城遗址和饮牛沟遗址一样，也是在凉城县永兴乡，位于饮牛沟东 2 公里的板城村西北的丘陵上，是岱海地区龙山时代老虎山文化遗址群的一处遗址。岱海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在永兴盆地，沿蛮汗山南麓由西开始有西白玉、老虎山、板城遗址一线相连，彼此间隔 3～5 公里。在此东面的岱海北岸，还分布着圪臭沟、园子沟、合同窑、大庙坡等遗址，与岱海南岸分布的仰韶文化遗址群相对称[12]。

特别是永兴盆地的 3 个遗址，在其聚落的周围都围有石城。其中，老虎山遗址的石城及其内部居住遗址的平面图已经发表。而对板城遗址的调查，虽然对居住址方面已经进行，但对石城尚未做详细的调查。这次在板城遗址进行的考古测量和调查，是对以上的补充。同时，继老虎山遗址之后，希望通过调查，进一步揭示岱海地区龙山时代石城中的居住遗址的面貌。

板城遗址的考古测量和调查于 8 月 19 日开始，8 月 27 日结束。同时，通过对北部石城城墙断面解剖，明确了围墙的构造。另外，对城内 F33、F34 进行了试掘，清理了 F35，补充了原有资料的不足。

岱海地区龙山时代石城居住地点，虽然一般选择在河川附近的低矮丘陵上，但居住区总是在丘陵顶部附近的比较高的地方，其特色是沿等高线形成的横向层面一段一段的营造。这样的聚落布局和构成，与上述的石虎山Ⅰ、Ⅱ遗址及王墓山坡上遗址几乎同出一辙，值得注意。而且，这种布局和构成，与最近发表的有关内蒙古东南部兴隆洼、白音长汗等地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及赵宝沟文化遗址相当一致。这一现象显示了两个地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七）三年来国际合作研究的成果与课题

在三年来的国际合作研究中，我们在岱海周边遗址群中，发掘清理了后岗一期文化早期阶段的石虎山Ⅰ、Ⅱ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王墓山坡上遗址，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饮牛沟墓地等 4 个遗址，并且对属于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板城遗址进行了考古测量和试掘。本书即是上述成果的一个总结。

关于岱海周边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做了许多工作，

并且已经发表。因此，仅仅利用这三年的研究成果，要对诸多方面的课题进行研讨，显然不妥当。只有参照以往的发掘报告并对其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才能够把握岱海地区整体的文化面貌。

以下记述的是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粗浅认识。

1．岱海地区农耕社会开始期的问题

对石虎山遗址进行考察，是为了探究岱海地区农耕社会开始期的问题。的确，从敞口或直口的陶红顶钵、陶釜形鼎，以及彩陶尚未出现等现象来看，石虎山Ⅰ、Ⅱ遗址都具有后岗一期文化早期阶段的作风，两遗址的年代也可以定在后岗一期文化的早期。

但是，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与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相比，在陶器的组合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认定二者为同一个文化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石虎山Ⅰ遗址和石虎山Ⅱ遗址之间，围沟的有无和陶器上的装饰等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以单一的视点来观察也会有问题。另外，两遗址均选择丘陵顶部来布局，并在丘陵顶部分阶梯状营建房屋，这都与内蒙古东南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的特色相一致。从遗迹的分布来看，两遗址与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文化也相类似，显示出与后岗一期文化的不同。发掘的时候，在两遗址的周围还打了很多的探沟去寻找墓地，但都没有任何发现，说明了与黄河流域聚落遗址在构成和布局上的不同。

如上所述，大的方面来看，石虎山遗址可以归入后岗一期文化的范畴，但在受到后岗一期文化波及的同时，石虎山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显示了与周边文化相互交往、融合复杂的一面。

以前，笔者一直认为，以兴隆洼文化为起点，从内蒙古东南部至辽宁省西部的新石器文化，不仅与长江流域，而且与黄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13]。也就是说，农耕生产只达到火耕等初级阶段后就停止了，狩猎和采集在生产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总之，石虎山Ⅰ遗址被围沟围绕着的聚落构成，围沟和灰坑中出土大量的兽骨，以及祭祀狗的现象等，都说明岱海地区的农耕社会中，狩猎还占很大的比重。

2．岱海地区农耕社会发展期的问题

我们在岱海地区发掘和调查的遗址中，有属于仰韶文化后期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型的王墓山坡上遗址。如前所述，这个遗址位于低矮丘陵的顶部，与上面的石虎山遗址相同。可是，在王墓山坡上遗址之前产生的王墓山坡下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王墓山坡下遗址位于从王墓山坡上遗址沿着山坡下去的平坦的河岸上。

从后岗一期文化早期的石虎山遗址开始，岱海南岸有仰韶文化中期的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后期的王墓山坡上遗址等遗址群。在仰韶时代的岱海地区，好像发展变迁的故事从未隔断，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从仰韶文化中期的王墓山坡下遗址开始，到后期的王墓山坡上遗址，遗址所选择的

地点在不断上升。对上升理由有一种解释是，由于伴随着岱海地区气候温暖化，岱海的湖面也在不断上升。这应该是其中的理由之一[14]。王墓山坡下遗址的详细资料虽然尚未发表，不过从看到的资料来看，有很强的庙底沟类型的成分。相对于仰韶时代早期沿桑干河溯流而上，由东面抵达岱海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系列的石虎山遗址，庙底沟类型是由南方沿黄河北上经鄂尔多斯高原到达岱海的新文化。王墓山坡下遗址选择了沿河岸的平坦地带营造聚落居住地，当然也是为了与农耕生产方式相适应。与此相对，王墓山坡上遗址的位置高于早期文化的台地，而且陶器、石器等显然与内蒙古东南部有过交流。加之，如果选择丘陵顶部做为居住地点，也是受内蒙古东部文化影响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在气候变动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呢？

大贯静夫先生发现，王墓山坡下、坡中、坡上遗址都有绳纹，但绳子的扭绞方向不同，坡上遗址和坡中、坡下遗址正好相反。当然，仰韶文化时期在岱海周围形成的文化遗址，并不是一群单一的固定居民们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有时从南方，有时又从北方或东方迁移到岱海来的人们共同形成的。绳纹方向不同的现象也正是以上事实的一个佐证。

3．畜牧民族的产生

关于东亚地区畜牧民族产生的年代等问题，虽有很多的假说，但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游牧民族的产生是这次合作研究所选择的课题，对此还是有必要表明一定的看法。一般的看法是，在游牧民族之前首先形成的是畜牧民族。关于畜牧民族的产生，主要有以下的观点，一是中国北部的农耕民中，除随着气候的寒冷化而南下的之外，留在原地的为了适应寒冷化渐渐变成了畜牧民[15]。还有一种观点是，由于农耕民本来兼备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而形成的[16]。笔者的认识上面已经有过记述[17]，中国北方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兴隆洼文化以后，经过赵宝沟文化，直至红山文化，在积极吸取由黄河流域传播而来的农耕文化的同时，保留了土著的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是否可以认为，农耕、家畜饲养相融一体的红山文化以及周边的住民，在之后的气候寒冷期到来的时候，成为了向畜牧民转化的最有力的候补者。

另外，以前一直注意的长城以北的细石器文化，虽是探究游牧民族起源课题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在还无法说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近年，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为了对陶器胎土内的植硅石进行分析，提供了一些陶器资料给宫崎大学农学部教授藤原宏志先生，拜托帮助分析，遗憾的是未能检出。在这里向担任分析的藤原教授表示感谢。

在三年来的岱海周围遗迹群的考古调查中，得到了内蒙古文化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我们国际合作研究的全面支持和协助，使研究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永远铭记。同时，对依照国家文物局的派遣，光临调查并指导的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2] 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浇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4] 刘清泗、李华章：《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岱海-黄旗海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图2，《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

[5]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6] 田广金：《内蒙古岱海地区仰韶时代文化遗址的调查》，《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内蒙古凉城县王墓山坡上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7年4期。

[8] 魏坚：《论庙子沟文化》，《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管所：《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依据这一报告，后岗一期文化^{14}C测定年代的早期为公元前4200～前4000年，中期为公元前4000～前3800年，晚期为公元前3800～前3480年。

[1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石虎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8年12期。

[1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县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3期，1984年。

[12] 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3] a. 秋山進午：《中国文明のあけぼの解説》《世界の大遺迹•9——古代中国の遺産》，講談社，1988年；b. 秋山進午：《紅山文化と先紅山文化——赤峰紅山考古、其の一》，《古史春秋》第5号，朋友書店刊，1989年（中文翻译：肖爱民：《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赤峰红山考古之一》，《北方民族文化——昭乌达盟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Vol.14，1993年6月）。

[14] 田广金、史培军：《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5] 田廣金：《中国長城地帯にちける農耕—牧畜—遊牧三段階窩展説討論》，《遊牧騎馬民族文化の生成と發展過程の考古学的研究—平成7～9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国際学術研究）報告書》，大手前女子大学文学部，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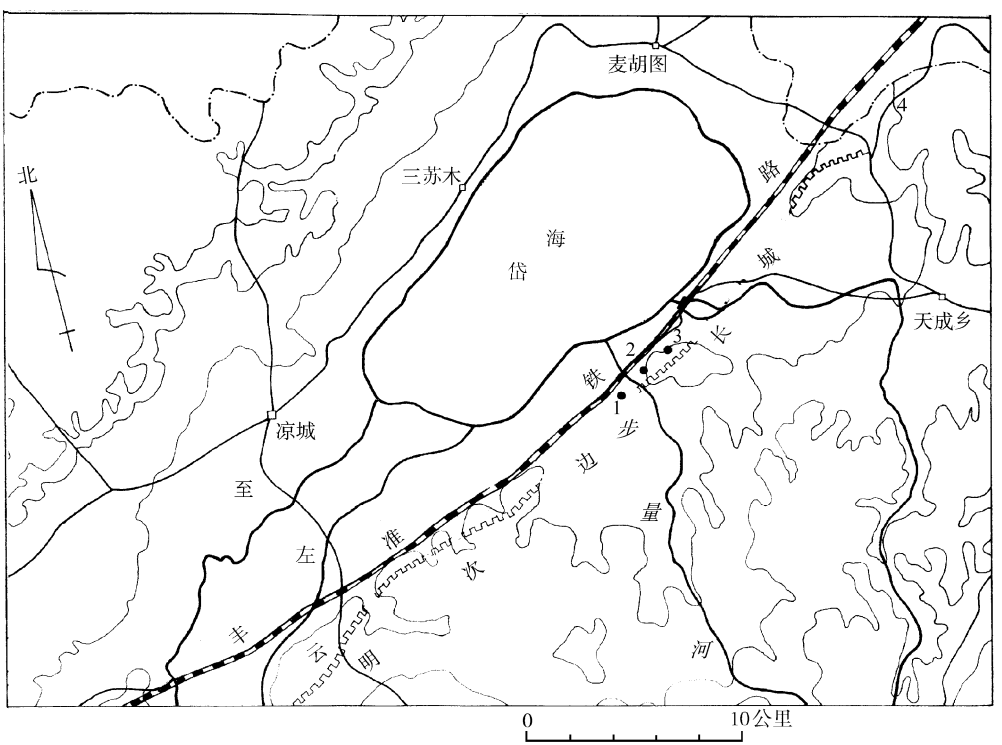
[16] 罗琨、张永山：《从我国早期畜牧民的产生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历史研究》1988年5期。

[17] 同[13]。

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

石虎山遗址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天城乡双古城村东南约2公里，西距凉城县海城镇约18公里，地处岱海南岸山地丘陵的顶部，属第一级台地，海拔高度为1348～1368米，地势略为平缓。遗址北距岱海约2.5公里，西距新石器时代王墓山坡上遗址[1]约500米，再往西隔步量河与狐子山遗址相望[2]，南距明代次边长城仅百余米，丰（镇）-准（格尔）铁路由遗址所在山丘脚下东西穿过（图一）。



图一　石虎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1．狐子山　2．王墓山　3．石虎山　4．红台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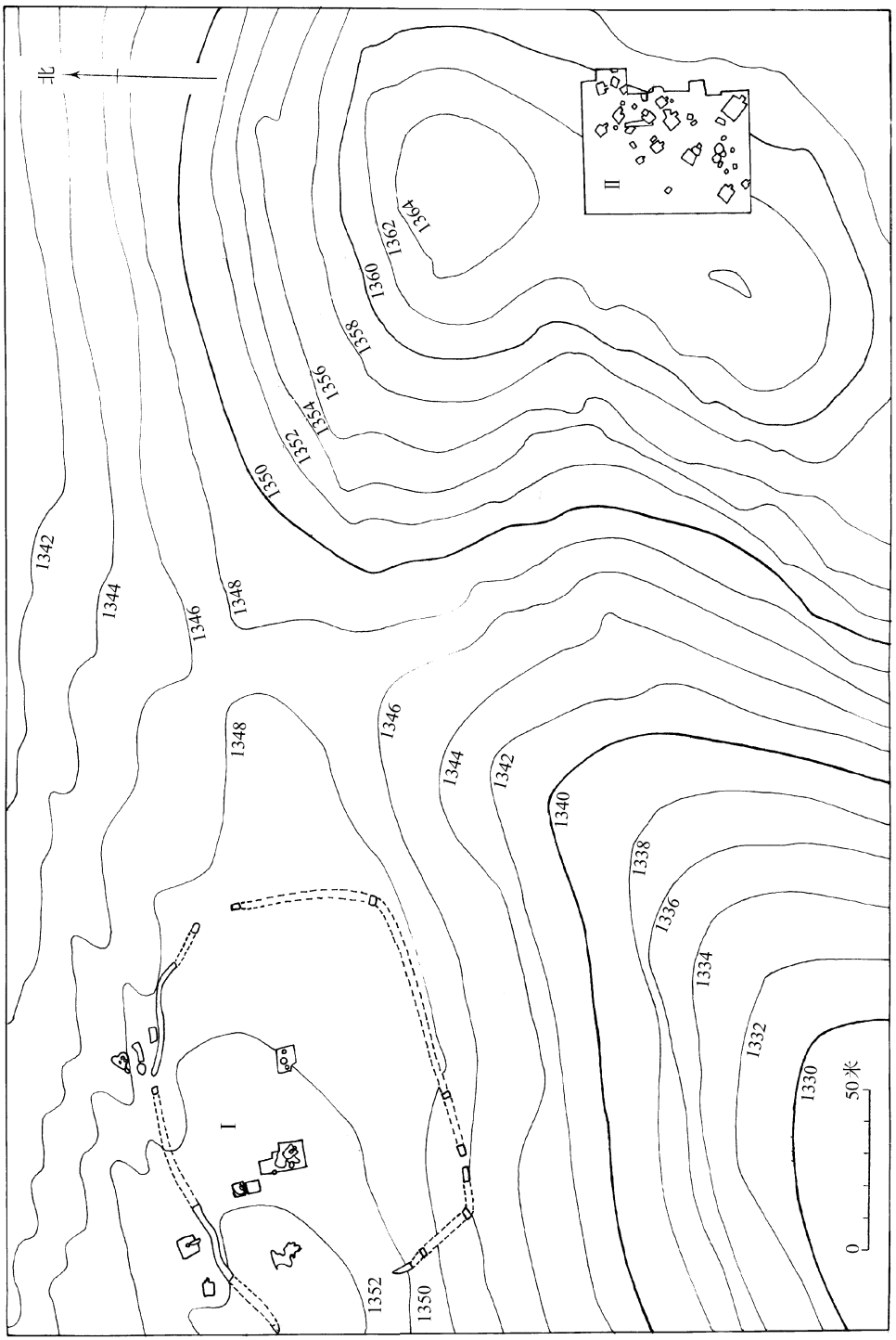
石虎山遗址1993年发现，并于同年试掘5米×5米探方4个，1995年试掘9米×1.5米探沟一条。为了弄清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及遗迹的分布情况，于1996年7月又对遗址所在地区进行了普遍钻探。1996年8月，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联合开展的“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考古学研究项目，重点对石虎山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清理发掘工作。中日联合考察工作结束后，9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进行了清理发掘和收尾工作。清理发掘工作总共历时约2个月，发掘面积约2800平方米，发现围沟1条、房址20座、灰坑36个、墓葬1座。

通过发掘、钻探和地面调查可知，石虎山遗址至少包含四种文化面貌、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遗存，时代分别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分布范围，彼此区域分割、互不相连，应是相对独立的四处遗址，因此分别编号为石虎山Ⅰ（简称SⅠ）、石虎山Ⅱ（简称SⅡ）、石虎山Ⅲ（简称SⅢ）、石虎山Ⅳ（简称SⅣ）遗址，以示区别。1996年度联合考察、清理及发掘工作主要位于石虎山Ⅰ、石虎山Ⅱ两遗址。关于石虎山Ⅲ、石虎山Ⅳ遗址的情况这里暂不涉及，将继续工作和另文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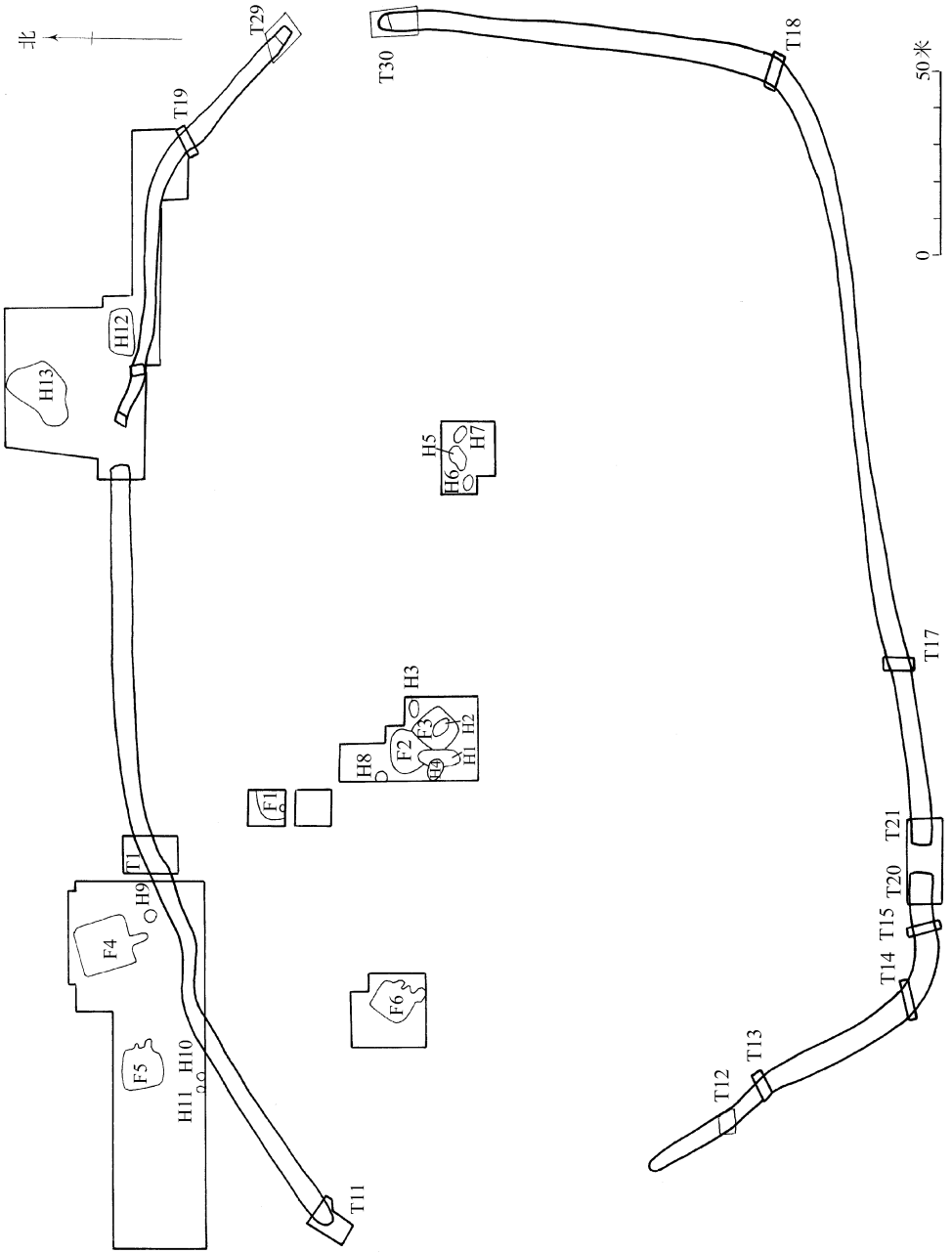
壹　石虎山Ⅰ遗址

一、遗址及发掘简况

石虎山Ⅰ遗址位于整个石虎山遗址区的西北部（彩版一，1），位于该丘陵顶部的略偏东南一侧，西部地势较高且陡，隔沟俯瞰王墓山坡上遗址，东、北部地势略平缓，北望岱海，南隔一洼地与石虎山Ⅱ遗址相距约300米（图二）。海拔高度1345～1354米，面积约15 000平方米。石虎山Ⅰ遗址的主要遗迹被一条平面略呈弧角长方形的围沟环绕，亦有部分遗迹位于围沟外。1993年发掘的探方编号为93ST1～T7；1995年发掘的探方编号为95ST1。1996年发掘的探方位于围沟处及围沟环绕区域以外（简称围沟外，下同）的依次编号为SⅠT1～T31（T28除外），位于围沟环绕区域以内（简称围沟内，下同）的绝大多数以西南角的O点为基点，按坐标法统一编号，前两位数代表纵坐标，后两位数代表横坐标，个别的与位于围沟外的依次编号（如T28即是）。发掘清理面积共计1270平方米，解剖围沟13处（统一编号为SⅠG），总长度约95米。于围沟内、外共发现房址6座（编号SⅠF1～F6）、灰坑12个（编号SⅠH1～H11、H13）、祭祀坑1个（编号SⅠH12）（图三）。



图二　石虎山Ⅰ、Ⅱ遗址地形图



图三　石虎山Ⅰ遗址遗迹分布图

二、地层堆积及地层出土遗物

（一）地层堆积

由于石虎山Ⅰ遗址地处丘陵顶部，地表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所以许多地区揭去耕土层即见生土，不仅地层堆积简单，而且遗迹亦多数破坏殆净，西部一些地方甚至基岩裸露。北部文化层堆积原本保存较好，但近代修整梯田时也大都遭到破坏。现以保存较好、位于遗址北部围沟外的 T4、T2、T5 西壁，T7、T3、T2 北壁剖面为例，就地层堆积情况说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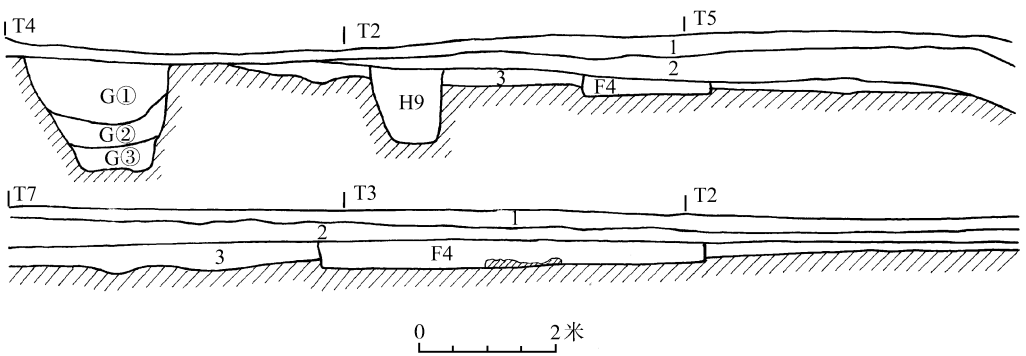
（1）T4、T2、T5 西壁

第 1 层耕土层。黄褐色细砂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须、小石粒及少量陶片等，厚 0.15～0.3 米。本探方内的围沟在此层下露口。

第 2 层扰土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内含蚌壳碎片及陶片等，厚 0～0.65 米。此层下露口的遗迹单位有 H9、F4。该层土分布不普遍，南部没有，往北依此渐厚，是近代修整梯田时人为形成的垫土层。

第 3 层文化层。黄灰色花土，土质较硬，内含遗物较少，出土少量的石器残块及陶片等，厚 0～0.35 米。

此层下即为黄色生土（图四，上）。



图四　地层剖面图

上：SⅠT4、T2、T5 西壁剖面图　下：SⅠT7、T3、T2 北壁剖面图

（2）T7、T3、T2 北壁

第 1 层耕土层。黄褐色细砂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须、小石粒及碎陶片等，厚 0.15～0.25 米。

第 2 层扰土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内含碎蚌壳及陶片等，厚 0.15～0.45 米。

此层系近代修整梯田时形成的垫土层，F4 在此层下露口。

第 3 层文化层。灰褐色花土，土质较硬，内含遗物较少，出土少量石器及陶片等，厚 0.1～0.4 米。

此层下即为黄色生土（图四，下）。

综合分析石虎山Ⅰ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可知，与遗址有关的地层堆积仅第 3 层，是遗址使用或初废期形成的堆积。发掘和钻探结果表明，石虎山Ⅰ遗址绝大多数地区的这层堆积都已被破坏，仅局部地区尚有保存。

（二）地层出土遗物

由于在石虎山Ⅰ遗址内的常年耕种和修整梯田，都对文化层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所以第 1、2 层出土遗物均较为丰富，尽管它们没有地层依据的价值，但为确保对石虎山Ⅰ遗址出土遗物认识的完整性，故对这两层中出土的遗物也一并进行介绍。另外，社员在常年耕种时，常将地表捡到的石器和较大的陶片扔到地垄边，所以，对于在工作中于地表采集到的标本（器号前冠之 SⅠC 符号以示区别），也归于这里进行介绍。

1．第 1、2 层

发现较多的石器和陶器。

(1) 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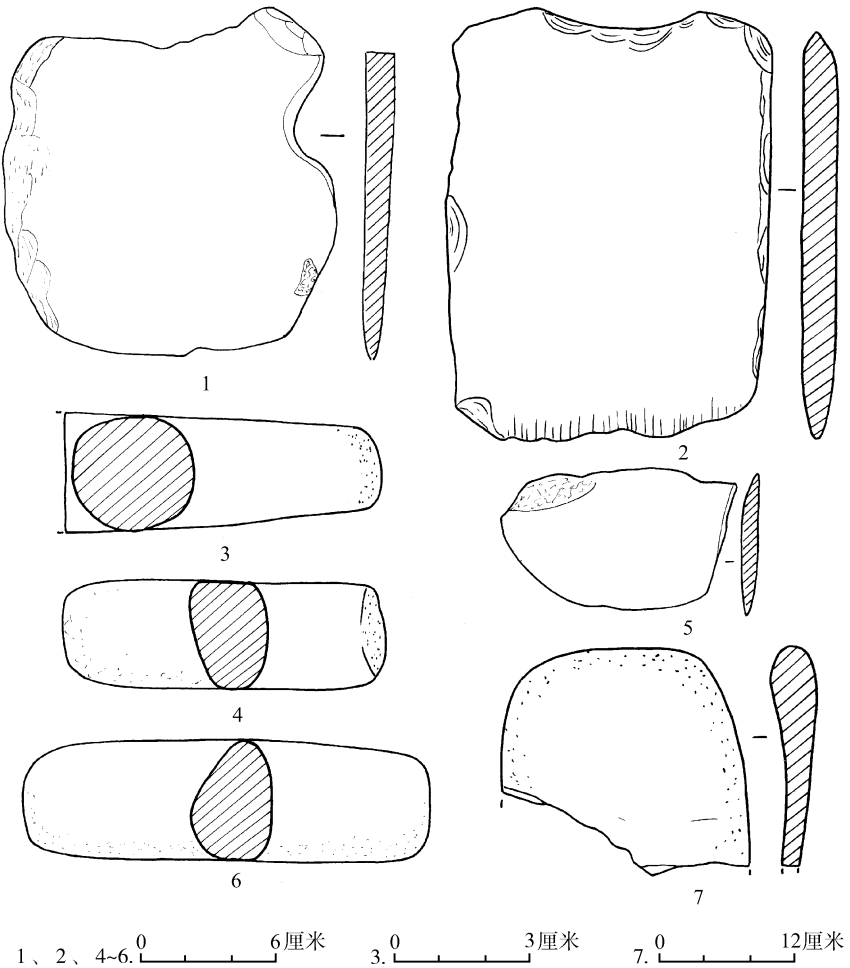
多通体磨制，少数局部尚存打制疤痕，形制规整，制作较精。器形主要有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石刀坯等。

石铲　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器物，除发现 3 件完整器外，还发现较多残块。均作扁平体，通体精磨，形制规整。标本 SⅠC∶1，整体作长方形扁平体，两侧边及顶部略存打制疤痕。顶部略凹，直刃略斜，刃部有严重的磨蚀痕。长 19.2、宽 14.2、厚 1.4 厘米（图五，2；图版六，3）。标本 SⅠC∶2，平面略呈弧角方形，一侧边及顶部略存打制疤痕。直刃微弧，平顶略凹，一侧边靠顶部有一缺口，长 15.5、宽 15、厚 1.2 厘米（图五，1；图版六，4）。

石磨盘　标本 SⅠC∶34，残，整体略作弧角长方形扁平体，底平，因长期磨蚀而中部薄两端厚。残长 20.4、宽 20、厚 1.6～4 厘米（图五，7）。

石磨棒　数量亦较多。标本 SⅠC∶8，残，整体作圆柱状，横截面作圆形。残长 7、直径 2.5 厘米（图五，3）。标本 SⅠC∶40，整体作圆柱状，横截面略作弧边三角形。长 18、直径 1.8～2.7 厘米（图五，6）。标本 SⅠC∶43，整体作扁圆柱状，横截面略作椭圆形。长 14.3、直径 3.4～4.8 厘米（图五，4）。

石刀坯　标本 SⅠT0302①∶1，为一用自然石片略经磨制的半成品，平面略呈椭圆形，平背微弧，弧刃。长 10.3、宽 6.2、厚 0.8 厘米（图五，5）。



图五　第1、2层出土石器

1、2. 石铲（SⅠC:2、SⅠC:1）　3、4、6. 石磨棒（SⅠC:8、SⅠC:43、SⅠC:40）　5. 石刀坯（SⅠT0302①:1）　7. 石磨盘（SⅠC:34）

（2）陶器

均为陶制生活用具的残片，器类主要有钵、碗、盆、壶、釜（鼎、罐）等。

钵　多数为细泥陶，有少量的夹砂陶，“红顶钵”占一定的比例。标本SⅠT7②:12，底残。红顶钵，细泥红陶，口部外侧呈橘红色，腹部为灰褐色，界限分明。敞口，弧腹斜收，圜底。口部器壁较厚，往下渐薄，器表经磨光。口径24厘米，残高8.6厘米（图六，1；彩版五，1；图版三，1）。标本SⅠC:22，底部残片，圈足钵。细泥红陶。圜底，矮圈足，下口微外张。素面磨光，圈足部有两两成对的镂空。底径9.6、残高3.6、圈足高2.2厘米（图六，15）。标本SⅠT1②:4，口、腹残片。夹砂灰褐陶，敞口，方

圆唇，弧腹斜收。素面抹光。口径 27 厘米（图六，2）。标本 SⅠT2②:4，夹砂红褐陶。敞口，圆唇，弧腹斜收，圜底。素面抹光。口径 11.6、高 6 厘米（图六，25）。

碗　标本 SⅠT1②:3，夹砂红褐陶。敞口，圆唇，斜直腹微弧，平底。素面抹光。口径 14、底径 9、高 5.6 厘米（图六，17；图版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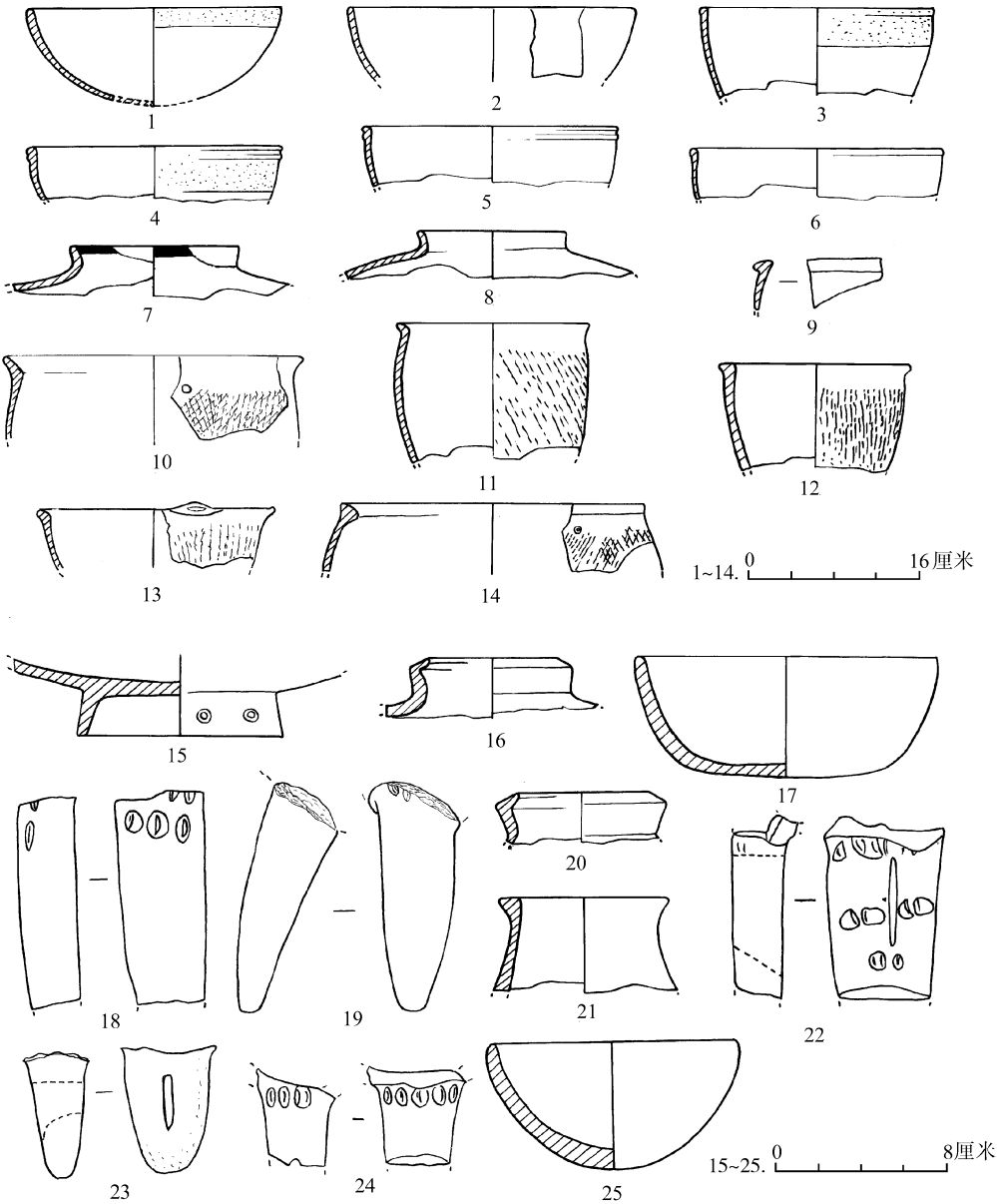
盆　均细泥红陶，器表经磨光，“红顶盆”占一定的数量。标本 SⅠT2②:3，口、腹残片。红顶盆，口部外侧呈橘黄色，腹部为红褐色，界限较分明。直口微敞，厚缘唇，弧腹斜收。口径 22、残高 8.6 厘米（图六，3）。标本 SⅠC:11，口、腹残片。红顶盆，口部外侧呈浅红色，腹部为深红色，界限分明。直口微敞，厚缘唇，唇外侧有周凹槽、似双唇状，弧腹斜收。口径 24、残高 5 厘米（图六，4）。标本 SⅠT6①:4，口、腹残片。直口微敞，厚缘唇，弧腹斜收。口径 24、残高 4.5 厘米（图六，6）。标本 SⅠC:18，口、腹残片。厚缘唇，唇外侧有周凹槽、似双唇状，弧腹斜收。口径 24、残高 6 厘米（图六，5）。标本 SⅠC:13，口部残片。敛口，圆唇，唇外缘尖凸，口部断面略呈铁轨状，弧鼓腹。口径 30 厘米（图六，9）。

折唇壶　均细泥红陶，器表经磨光。标本 SⅠT7①:1，口部残片。小口，折唇，束颈，口径小于颈径。口径 6 厘米（图六，16）。标本 SⅠT7②:11，口部残片。小口，折唇，束颈，口径略小于颈径。口径 6 厘米（图六，20）。

小口广肩壶　均细泥红陶，器表经磨光。标本 SⅠT0402①:4，口部残片。小侈口，圆唇，矮领，广肩。口径 14 厘米（图六，8）。标本 SⅠT3②:4，口部残片。小侈口，圆唇，矮领，广肩。口部内、外侧均施黑彩。口径 16 厘米（图六，7）。

长颈壶　标本 SⅠT7②:2，口部残片。细泥红陶，器表经磨光。小敛口，方唇，唇外缘尖凸，细长颈。口径 8 厘米（图六，21）。

釜（鼎、罐）　夹砂红陶或红褐陶，均夹细砂，所掺和的砂粒既小又均匀，类似于砂质陶或就属砂质陶，仅有少数夹砂陶所夹砂粒较大，多数夹砂陶陶胎中掺和有石英、云母（蚌粉）。由于发现的残片中口、腹片极多，平底极少，而所发现的鼎足其陶质、陶色、纹饰等，又均与这类陶片相同，因此，这类器物应多为圜底釜或釜形鼎，仅少数为夹砂罐。标本 SⅠT2②:5，口、腹残片。夹砂褐陶。敞口，圆唇软斜折，弧腹斜收。口部外侧抹光，往下饰竖行细绳纹，印痕浅、疏，唇部外侧设舌状？纽。口径 22 厘米（图六，13）。标本 SⅠC:24，口、腹残片。夹砂红陶。直口，方唇、唇外缘尖凸，斜弧腹，口径略大于腹最大径。口部外侧抹光，往下饰略交叉的细绳纹，印痕较深且乱。口径 18、残高 10 厘米（图六，12）。标本 SⅠT2②:6，口、腹残片。夹砂褐陶。敛口，尖圆唇斜侈，弧鼓腹，口径与腹最大径略等。口部外侧抹光，往下饰斜行细绳纹，印痕较浅。口径 18、残高 13 厘米（图六，11）。标本 SⅠT1②:6，口、腹残片。夹砂红褐陶。侈口，圆唇，斜折沿，弧鼓腹。口部外侧抹光，往下饰交叉细绳纹，印痕较浅。口径 28 厘米（图六，10）。标本 SⅠC:27，口部残片。夹砂红褐陶。敛口，圆唇，唇内、外缘鼓凸，口部剖面呈铁轨状，鼓腹，口径小于腹最大径。口部外侧抹光，往下饰交叉



图六　第1、2层出土陶器

1、2、15、25. 钵（SⅠT7②:12、SⅠT1②:4、SⅠC:22、SⅠT2②:4）　3～6、9. 盆（SⅠT2②:3、SⅠC:11、SⅠC:18、SⅠT6①:4、SⅠC:13）　7、8. 小口广肩壶（SⅠT3②:4、SⅠT0402①:4）　10～14. 釜（鼎、罐）（SⅠT1②:6SⅠT2②:6、SⅠC:24、SⅠT2②:5、SⅠC:27）　16、20. 折唇壶（SⅠT7①:1、SⅠT7②:11）　17. 碗（SⅠT1②:3）　18、19、22～24. 鼎足（SⅠT7①:2、SⅠT6①:7、SⅠC:32、SⅠT1②:11、SⅠT0202①:3）　21. 长颈壶（SⅠT7②:2）

细绳纹。口径 28 厘米（图六，14）。

鼎足　标本 SⅠT0202①:3，夹粗砂红褐陶，整体呈圆柱状，横剖面略呈圆形，足根残。鼎足正面靠足、腹相接处有一横排指窝纹。残高 4.6、直径 2.6～3 厘米（图六，24）。标本 SⅠT7①:2，夹砂红陶。整体略作扁圆柱状，横剖面呈椭圆形，足根残。鼎足正面靠足、腹相接处有二横排指窝纹。残高 10、直径 2.6～4 厘米（图六，18；图版四，3 左）。标本 SⅠT6①:7，夹砂红褐陶。整体略呈圆锥状，稍弯曲，横剖面呈弧角弧边长方形，略呈斜向与器腹相接。器表素面，与器腹相接处有一横排指窝纹。高 10、宽 1.5～4、厚 1～3 厘米（图六，19）。标本 SⅠC:32，夹砂红陶。鼎足正面略呈长三角形，横剖面呈椭圆形，足根残。鼎足正面饰上下三排指窝纹，中部有一纵向窄长条镂孔。残长 8.6、宽 4～5.5 厘米（图六，22；图版四，4 左）。标本 SⅠT1②:11，夹砂红褐陶。整体略作鸭嘴状，横剖面呈椭圆形。鼎足中部有一纵向窄长条镂孔。高 6、宽 2～4.6厘米（图六，23）。

2．第 3 层

除出土个别石器外，均为陶质生活用具。

（1）石器

仅发现石磨棒及石铲残片。标本 SⅠT1③:1，石磨棒。整体略作圆柱状，横剖面略呈椭圆形。长 16、直径 4～5 厘米（图七，11；图版六，2）。

（2）陶器

陶器的质地以夹砂陶为主，约占 70％，泥质陶次之，还有占不足 2％的夹蚌陶。夹砂陶多夹细砂，所掺和的砂粒既小又均匀，类似于砂质陶或就属砂质陶，仅有少数夹砂陶所夹砂粒较大，为真正意义上的夹砂陶。泥质陶的陶土多经淘洗，质地细腻。夹蚌陶手感柔和，质地坚硬。另外，夹砂陶和泥质陶中，还分别有掺和石英及云母者，陶胎中星光点点，尤其是泥质磨光陶，红色器表辅之以星星银毫，风格分外别致。陶色总体上以褐陶为主，红陶和红褐陶次之。其中，夹砂陶以褐陶为主，红褐陶次之，另有少量的红陶。泥质陶则以红陶为主，褐陶次之。陶器以饰绳纹者为主，另有少量的磨光、素面及划纹。其中，夹砂陶饰绳纹者占 90％以上，泥质陶则全部为磨光和素面。“红顶钵”、“红顶盆”的数量占较大比重，个别泥质红陶钵的口部外侧施一周红彩。陶器的制法均为手制，多采用泥条圈筑或泥片贴筑法。部分器物口部经慢轮修整，器物内壁多抹光，壶类小口器物的颈部内壁多保留清晰的泥条圈筑痕，部分泥质陶器的内壁保存有用工具刮、抹形成的痕迹。陶器器形规整，烧制火候高。器形以三足器、圜底器、平底器为多，有少量的圈足器。其中，夹砂陶中较大型的器物绝大多数为圜底器和三足器，极少数为平底器，口部外侧带二至四个舌状？纽的器物较多。有一定数量的双耳器，既有拱形耳，也有竖窄鼻耳。器类主要有：钵、盆、釜（鼎、罐）等。

钵　标本 SⅠT7③:3，口、腹残片。细泥红陶。略呈红褐色，敞口，圆唇，弧腹斜